

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他的变法为何注定失败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初春二月,半赋闲于江宁(现南京)的王安石接到朝廷诏令,第二次任命他出任宰相。此时距离他辞去宰相职务不过8个月。

这一次,王安石没有像以往那样一再推辞,而是接到诏书后立刻北上,仅用了6天时间就抵达汴京赴任。在坐船途经瓜洲渡时,他写下了《泊船瓜洲》这首后世广为传唱的名句: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首诗里流露出来的归心似箭的情绪,似乎与一个正要奔赴宰相重任之人的形象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但王安石当时的心情确实相当矛盾,也很无奈。

他一手发动的变法此时已到了关键时刻,而他推荐的主持变法的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吕惠卿不仅辜负了他的期待,反而在背后搞了很多小动作,意图不利于他,而且还与皇帝和当时的宰相韩绛关系紧张,以至于皇帝不得不重新召他回京。

王安石自己当然也很想要再推动一把,亲眼见证自己的变法大业有所实效。然而,一生淡泊名利的他原本就不热衷于当官,推进新法过程中引起的很多激烈矛盾乃至旧友反目已让他身心俱疲。去年他连辞六次,神宗才勉强同意罢去他的宰相职务。

王安石多么渴望在自己从小长大的金陵归隐山林,再也不问世事。所以,他希望此去汴京,能够速战速决,速去速回。

但王安石的第二次宰相任期短暂而不成功,除了引发更加汹涌的朝野纷争,他没能干成什么。

第二年,熙宁九年(1076年),当他年仅33岁的长子王雱病逝,悲伤之极的王安石再也没有心思操持政务,替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神宗分忧了。前一年的十一月,他刚刚失去弟弟王安国。熙宁九年十月,56岁的王安石再度罢相,回到江宁府。

此后他又活了10年,寄情钟山之间,终日谈佛论禅,与友人唱和诗文。朝廷给了这位退职宰相以无以复加的崇高礼遇:不仅薪俸分文不减,每遇祭祀之类礼仪大典,皇家都不忘降旨特请他以宰相身份赴京参加;逢到大事,皇帝几乎都会来信告知并征求他的意见;朝廷和皇帝还会时不时地给他送去一些问候和礼物……

不过王安石再也没有回过开封,直到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

年仅20岁的宋神宗赵顼即位的时候,北宋差不多已经走过百年,他沮丧地发现自己接手的是一付难以为继的烂摊子。

与之前汉唐这样的大一统王朝相比,北宋自立国之初起国势就弱得多,它面临着北方的大辽和西北方的西夏两个外夷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持续袭扰。真宗“澶渊之盟”后,宋朝以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岁币”(后又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的代价,与虎视眈眈的契丹人之间达成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

但这不仅给宋朝造成了高昂的财政负担,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屈辱感。

因此,振作国势,收复五代时被石敬瑭割出去的“燕云十六州”汉唐故土,一直是北宋有志之士的共同抱负。

真宗的后任仁宗赵祯是中国历史上绝少有一位谦逊节制、宽厚仁慈的君主。他十分愿意倾听批评意见,从不堵塞言路,对待臣下也是赏厚而罚轻,绝对当得起谥号中的“仁”字。

这造就了仁宗一朝空前的思想文化繁荣,大名鼎鼎的政治家范仲淹和文彦博,词人柳永和晏殊父子,以及一代文宗欧阳修等人,都是在仁宗时代脱颖而出的。

不过,我们在称颂这位君主的同时恐怕也不得不说,仁宗的宽厚仁慈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深了北宋政治原有的积弊。

在范仲淹领导的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1043~1044年)尚未开始便告夭折之后,到宋仁宗长达40多年统治的后期,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因循苟且、不思进取的萎靡之气。时人一针见血:“嘉祐之末,天下之弊在于舒缓。”

尤为紧迫的是,由于边境时有战事,将兵越征越多,加上仁宗待臣下优厚,各种赏赐不断,朝廷与地方上不合用的“冗吏”、不能战的“冗兵”和不合理的“冗费”到四处充塞。国家财政连年亏空,几陷于崩溃。

据《宋史》载,到仁宗的后任英宗治平二年,朝廷的财政赤字达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千五百七十二万两白银。这是一个无法维持下去的局面。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社会在北宋时期正

经历一系列深刻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商业贸易和货币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日益提升;城市生活以及大城市逐渐兴起,东南沿海一带尤其领先,堪称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经济中心地带;民众的普遍教育水平显著提高;思想学术和娱乐文化繁荣而多元……所有这一切都无比生动地浓缩在一幅《清明上河图》的长卷中。

这样的经济文化繁荣、多元和开放也催生了许多全新的问题,例如与日俱增的贫富差距和大量不能被束缚于固定土地、甚至游离于士农工商四阶层之外的流动人口的出现等等,它们都对根基于农耕社会的中国传统政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站在现代人的视野来看,这是一个旧秩序正在瓦解、新世代的曙光乍现于地平线的时刻。

王安石正是在这样一幅历史图景之下横空出世的。

如果不了解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基本背景,你就不容易理解王安石的改革为什么将经济或者说理财方面的内容当作头等大事。

后世无数腐儒动辄批判王安石“重利轻义”,然而王安石最大的政敌司马光以及围绕在司马光周围的所有比较知名的“旧党”人士,像二程兄弟、二苏兄弟等,直至南宋时期王安石最主要的批评者朱熹,都很少简单地没有以“利”“义”之分来攻击王安石。

除了因为这些伟人们的眼界和格局不同凡响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深切的体认。他们都是当事人,深知时局之艰难,也感受到了时代变迁的脉搏。

“得君行道”是中国古代儒家念兹在兹的最高理想,所谓“致君尧舜上”。然而在大一统皇权专制时代,这个理想基本上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皇权与儒家士大夫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相同,甚至经常是尖锐对立的。

但这个梦想奇迹般地在王安石那里得到了实现。当他与比自己年轻20多岁的宋神宗相遇时,他们之间必定是发生了什么神奇的化学反应。这是一次千年不遇的“君臣聚合”,由此掀起了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政治变革。

可以说,王安石几乎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位有机会将自己的政治理念真实完整地付诸社会实践的政治家。这也是他最让后来的儒生士大夫羡慕之处,王安石面对皇帝时候的很多做派,后代中国读书人连想都不敢想一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县)。《宋史》本传称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他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22岁时进士及第,此后屡屡以家贫、俸禄太薄等理由拒绝朝廷对他的大多数任命,但时人对他的推崇日盛。王安石49岁参知政事,50岁时出任宰相,启动变法。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并与同时代三苏、欧阳修和曾巩一起位列“唐宋八大家”之列。

今天(2021年12月18日),是这位中国历史上引起最多争议的大人物的1000周年诞辰纪念日。

二 宋英宗在位仅四年就去世了,他的儿子神宗继位时尚不满20岁。这位志向高远、意志坚定的年轻天子甫一临朝,就把自己慕名已久的王安石招来京城,开始了一场急切而又全面的变革。

当代宋史权威刘子健先生恰如其分地将王安石的新政划分为“变法”、“反变法”与“后变法”三个阶段——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参知政事,开始启动变法。四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亦即宰相。变法进入高潮。七年六月,罢知江宁府。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再罢。王安石离任后,神宗亲自主持变法。

从启动到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相继去世,即1069年至1085年为“变法时期”。

刘子健先生所说的“反变法时期”,即史上所称之“元祐更化”(1085~1093年)。在这段时期,神宗崩,哲宗即位,宣仁太皇太后听政期间,司马光被启用为宰相,旧党上台,新法尽废,新党人士尽皆罢黜。

“后变法时期”则从宋哲宗亲政,所谓“绍圣绍述”,直到宋徽宗禅位,即从1093年至1125年。期间大部分时间由权臣蔡京把持朝政,以行新法之名封堵反对派之口,镇压迫害政治上的异己。蔡京是王安石女婿蔡卞之兄,他执政期间一手遮天,贪赃枉法,

终致靖康事变,北宋覆灭。

王安石的新法一共有十多条,涉及经济、军事、吏治和科举等几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们并非同时推出,而是从熙宁二年七月起陆续施行,历经多年,而且也像今天的大多数改革举措一样,往往先在某地试点,然后再铺开到全国,中间还有暂停和反复。

本文不可能逐一详解这些新法的内容,我从中选择几条意义重大且引发了激烈纷争的法令稍加概述。

首先是青苗法。

在农业时代,每年春耕时农民在财务上往往十分紧张,这就是成语“青黄不接”的来源。他们会向富户借贷,于是就出现了困扰历代的高利贷问题。王安石新法让官府以低于市面的利息向农户放贷(当时定在半年20%),到收成时再连本带利收回。他认为,此举既挤掉了高利贷,又令官府获得了一笔税收之外的额外利息收入,是利国利民的一举两得之举。

其次是市易法。

它在性质上与青苗法异曲同工,只是针对的是城市商品市场。宋朝商业发达,大宗消费品市场交易活跃,自然也出现了所谓“奸商”串通压低进货价格、囤积居奇,再到市场上以数倍高价出售的现象。市易法让政府直接开办批发市场,并以最大买家和卖家身份进场交易。王安石认为,这既能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也为政府赚得了商品交易中的中间利润。

引发最大争议的是免役法,亦称募役法。刘子健先生认为,它居于王安石新政的中心,是整个变法的缩影,也是新法不同以往的特点之最集中体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募役法不仅在变法时期中引起新旧两党尖锐争议,还在“元祐更化”时期直接造成了旧党人士的一次大分裂。

王朝时代的中国,老百姓除了税,还要根据官府的要求定期服役,即无偿出劳力服务于修路、造桥、水利、军需后勤等政府之需。这些徭役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税,官府强行摊派,没有人可以逃避。但当某地大量壮劳力被抽去服役的时间恰好与农忙季节重叠时,就会出现当地良田缺人耕种、甚至抛荒的不利局面。

王安石新政将徭役改为让老百姓用交钱来代替出劳力,官府再用征收来的钱到市场上去雇劳动力来完成所需之工程服务。这实际上就把徭役改成了税,他认为这既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又让一批无地可耕的人得到了生计,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新法还包括均输法(它是最先推出的第一条新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保马法、免行法、将兵法等。此外,王安石还大刀阔斧地改革科考制度,废除传统的明经、辞赋、帖经墨义等科,一律以经义策论取士。

综合起来看,这些王安石变法呈现出以下几个两个鲜明特征:

其一,新法非常偏重于经济和财政,也就是传统史家所说的理财。

讨论变法之初,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确定的变法目标是“人才练、财用足、风俗变、政令行”四条,但从新法推出后的实际情况来看,其中一大半与理财有关。这可以说是对当时迫在眉睫的国家财政窘况的一种回应。

其二,新法非常重视货币在经济中的功能,它大量地用货币和金融手段取代传统的实物和劳务。

实际上,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和免役法中均体现了这种原则,这是王安石经济思想的最大特征,也对当时正在萌芽发育的现代商业经济的一种顺应。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王安石的现代拥趸们津津乐道地说,他的变法带有鲜明的现代性,如果能够顺利推进,就将早于西方几百年把中国带入现代。

三

但王安石与宋神宗意气奋发地谋划的新法,甚至在尚未正式颁布施行之前,就遭到了一片反对之声,不仅他的同辈,就连那些昔日慕王安石这位后生才子大名而热情向朝廷推荐他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也一个接一个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他们不方便直接向当朝天子开炮,于是就把一腔怒火倾泻到了为皇帝出谋划策的王安石身上。

变法之初,王安石推荐和启用了同辈中许多品学兼优的一流人才。朝廷专门为变法而设立了一个决策咨询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程颢和苏辙二人都曾是其中的官员。

后来的反变法领袖司马光一开始也没

有表现出那种僵硬的保守主义,相反他对王安石受大用也抱着殷切期望。早年他与王安石是好友,经常在一起纵论国事,被并称为“嘉祐四友”。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很快都变成了王安石的激烈反对者。

当时备受尊敬的前辈政治家韩琦、富弼、欧阳修和文彦博等也纷纷站出来抨击新政。欧阳修不但上书要求废止青苗法,还在自己当时任职的青州地方拒不放贷青苗钱;身在中央的富弼也公开吩咐自己的门生们在各地抵制青苗法;至于文彦博,他竟然断言华州的崩塌是市易法引起的天怒人怨……

他们都曾是20多年前“庆历新政”的直接参与者,可以说也曾是锐意进取的改革派。欧阳修还是长期以来最赏识王安石的文坛领袖,正是他第一个向朝廷热情引荐的王安石。

如果把他们都看成是因循守旧、碌碌无为的保守势力代表,恐怕是有失偏颇的。某种程度上说,这或许确实体现了王安石对传统儒家价值观的某种背离。

那么,新法为什么会引发那么大的争议?而变法派与“旧党”之间的主要分歧又集中在何处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分成两个层次来讨论——

首先是新法操作的技术层面问题。

作为新法最早的反对者,司马光很早就指出了这些看似一举多得的“良法”,在执行层面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弊端。

以青苗法为例,它在设计上似乎能降低利息,挤出高利贷。然而但凡是生意就必然会发生违约,乃至纠纷,过去的借贷发生在民与民之间,如果发生了纠纷,官府作为中立方至少在理论上是作出不偏不倚的公正裁决。现在贷款给老百姓的变成了官府自己,万一老百姓认为有不公之处,还能找谁去伸冤?

而在另一方面,当朝廷将推行新法的成效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就会有官员向并没有借贷需求的老百姓强行摊派青苗钱,为的是到庄稼收成时能够收到更多利息钱,以体现出自己的突出政绩。这在当时称为“抑配”。

虽然朝廷曾三令五申禁止官府抑配,但苏轼曾一针见血地说,只要青苗钱是依靠官府发放的,这只能是空文。

市易法等其他一些新法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类似性质的扭曲和走样。

如果放到亚当·斯密以后建立起来的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内来审视,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

司马光他们或许不懂亚当·斯密的启蒙理论,但他们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传统儒家政治伦理的教诲,例如坚决反对官府“与民争利”等等,恰是暗合这些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

然而,新法中的有些部分,例如我在前文提及过的免役法(募役法)却在旧党中也引起了巨大的纷争。在略小一点的范围内,保甲法也面临类似情况。

“元祐更化”时期,司马光一意废除所有新法。旧党中的一大批人士,如范纯仁、苏辙、范百禄、李常等人,对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表达了反对。苏轼则是他们中最突出的代表,他认为,既然新法已经过长达近20年的实践,就应当认真细致地对它们“较量利害,参用所长”。

他反对因人废事,凡是王安石提出的就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废止。他认为,相较于差役法,免役法利远大于弊。

为此,他曾与在短短十几天里把自己火箭提拔到礼部尚书位置上的司马光面争于政事堂,半步不肯退让。退朝以后依然余怒未消,大骂“司马牛”,对司马光的固执僵硬气愤不已。

所幸司马光担任宰相不满一年就去世了,那是元祐元年九月,距离王安石去世才几个月。否则,桀骜不驯的一代文豪苏东坡很有可能与自己这位最坚定的政治支持者和一生的挚友彻底闹翻。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君实(司马光的字)始怒,有逐公(苏轼)意……”

而在新党方面,据说彼时已退隐金陵许多年的王安石在最初听到司马光出任宰相、新法纷纷被罢时,尚能“夷然不以为意”。以他的自负,显然认为新法那么好,根本废除不了。

但当得知免役法被正式废除时,他愕然失声道:“亦罢至此乎?”随后又喃喃地说:“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两年乃行,无不曲尽。”

由此可见,免役法经过极为周全详尽的考量与权衡。

(下转第47版)